

沈从文正传

凌宇 著

沈从文正传

凌宇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正传/凌宇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
(名家正传丛书)

ISBN 978-7-5399-3123-4

I. 沈… II. 凌… III. 沈从文(1902~1988)—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566 号

书 名 沈从文正传

著 者 凌 宇

主 编 金宏达 于 青

责任编辑 赵 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7.3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23-4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 引

这套书,特别要说明的,是“正传”二字。

鲁迅先生当年为《阿 Q 正传》题名之时,颇费斟酌,各传名目繁多,皆不好用,最后,便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提取“正传”二字,用于阿 Q,类乎戏笔。

其实,“正传”实很必需,在一个“戏说”盛行的时代。我们的“名家正传”,便是廓除“戏说”,本于信实,由有研究功力的作者以简赅之文辞,诚恳之态度,状名家之风貌,留历史之真迹。

其先,或已有更宏博厚重的评述,现在的本子,则是较扼要的一种,原因无他,乃是景观太多,时间有限,必得偏劳内行的人士,设计了最佳的路线,逐一指引给我们看。

当然我们期待,借此路径,让更多的名家,走近更多的读者。

主 编 启

目录

1	引 子
9	第 一 章 在别一个国度里
17	第 二 章 自然之子
35	第 三 章 身小师爷传奇
55	第 四 章 生命的转机
73	第 五 章 卑微者之歌
95	第 六 章 海上的旋流
119	第 七 章 南风北雨
147	第 八 章 无形的防线
167	第 九 章 飓风孤舟
181	第 十 章 在历史的瓦砾堆里
195	第十一章 处变不惊
211	第十二章 桑榆非晚

引 子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童谣就一直这样唱着。

夜阑人静，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点数，估猜着哪一颗可能属于自己的星星。并由己及人，从亲朋熟人，到伟大巨匠。未了，终不免迷茫，空留几分神秘，一丝惆怅。

一颗流星！它带着令人炫目的光辉掠过夜空，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宇宙万物有成有毁，人也有生有死。然而，人终究还能通过精神文化产品，在自身肉体死灭之后，使生命获得长存。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在其创造性的产品中，刻下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生命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熠熠照人，如烛如金^[1]。

这是沈从文思索生命意义时说过的话。

他终于通过一生创造性的劳动，完成了生命的转移。当人们接触他所留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时，便立即感到其中燃烧的生命热力。

我仰面凝望星空，试图寻找沈从文的位置时，突然想起幼时家乡父老所说的沈从文是“文曲星”的话来。那时，我自然不懂何谓“文曲星”，也不知道它在天空中的位置，朦胧中却感到一种神秘，留下了沈从文异于常人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北京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五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十二平方米，还兼做客厅，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

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

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

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做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戟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2]

然而，这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人生，与沈从文是渐离渐远了。此刻，就在他所居的公寓大楼的下面，正奔涌着不息的人流。南来北往的，东奔西走的，正上演着新的人生戏剧。同样有得意，有失败；有善良，有罪恶；有笑，也有泪……人生的书籍正一页页翻开去。可是，他已无力去翻阅这本大书了。

他心头自然还有他所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三十

余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要谈起有关的种种。他常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地方又有了新的文物出土，应该亲自去看看，也无能为力了。”话语中总是透着惆怅与悲哀。

确实，在明确意识到的范围内，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未竟的文物研究。我曾看过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和沈从文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记录：

……“假如你处的社会一直没有转变，对文学的要求也没有变化，你会继续写下去吗？”我问。

他笑着说：“那不能不改变！”

我继续追问：“那假如一直没有改变呢？”

“那当然是改变好一点。因为文学也许只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太小了。”

我仍不肯放弃：“那假如不改变呢？”他顿了顿，慢慢地说：

“也许可能，也许可能。……也许可能，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正是写小说的时候，《长河》那样的就没有写完。”

“现在不是因为上面喊我去，有限制我的框框，而是我自己的框框，我自己形成的，自己有种限制，自己想这样想那样，考虑的方法不同。”

想起“这个东西”（指他的文学创作——笔者注），他轻轻地感叹着：“也可能，也可能的……。”

他当然不能完全割舍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人生世界是以中国西南的一小角隅为中心建构的。从表面看，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作家。可是，从深处看，这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仅其中厚积的文化沉淀闪耀

着迷人的光彩，而且澎湃着特定的区域环境与外部世界环境对流的巨大浪潮。一位美国的福克纳研究专家 H. R. 斯通贝克，将福克纳与沈从文比较以后，得出沈从文是中国的福克纳的结论。1984 年，来中国讲学的 H. R. 斯通贝克回国之前，企望着实现自己拜访沈从文的夙愿。当他得知沈从文正重病在身时，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计划。不久，他从美国给沈从文寄来了一组表白自己心迹的诗篇。在其中一首的结尾，作者写道：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
我重建了亭子和宝塔，
在渡口，献给本地的神祇，
保佑风调雨顺，天时地利。
我知道许多管渡船的老人，
在迷人的渡口守望着河流。
但是，我只知道一个翠翠，
我也知道她永远等待我
从那丛山中奔流而下的小溪边上，
在一个比游鱼出没还深的梦里，
她永远等待
我过渡，就在边城那边。

就在边城那边，有着曾经养育过沈从文的土地和人民。他就是从那片土地上，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这世界的。他无时不在眷念着那片土地，对故土的爱，使他几近迷狂。1984 年，湖南的一位青年作家刘舰平来北京探望他，其时，他因病无法行走，正躺在床上。当得知刘舰平是沅陵人时，他非常高兴地说：“沅陵是个好地方，美极了，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写《湘西》时，就是把凤

凰和沅陵做重点。好多年没到沅陵去了。1982年回湘西，本来要去的，后来时间来不及了。”刘舰平向他转达了家乡父老的问候，请他有机会再去沅陵看看。他连忙说：“要去的，我是要去的。”刘舰平表示等他病好一些，就一定接他去。

“我能去，我还能去的！”说着，他便挣扎着要站下地来，并终于奇迹般地站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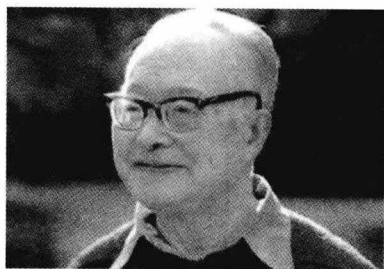
“你看，我还能去！”他孩童般得意地笑着，眼角上早已噙了两颗晶亮的泪珠。

然而现在，就连这一点愿望大约也很难实现了。他终于只能在想象同回忆里，同那片熟悉的土地亲近。

注释：

[1] 沈从文：《烛虚》，上海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

[2] 《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沈从文

2000

2000

2000

第一章 在别一个国度里

一、写在断墙残碣上的历史

倘若人的所思所想与其主体之间，连接的是一条有形的线索，那么，这时正可以从北京前门大街公寓的这一端，沿着这条线路做一次长途旅行。从北京向南，走三千余里至长沙，再向西北行四百里，便到了古称武陵的常德。如果手里刚好有一份中国地图，你就会发现，在北面，标志长江的蓝色粗线由西向东蜿蜒，与洞庭湖衔接。湖右沿江横亘着巫山山脉；湖西南方向，武陵山与雪峰山恰似两道屏障，切断了与洞庭湖泽地带及湘中的联系；越雪峰山，入贵州境，西南壁立着大娄山脉与云贵高原，这个被大山包围着的三角形地带，就是湘、鄂、川、黔四省相交的边境地区。其中，属于湖南的部分，便是秦置黔中郡，汉置武陵郡的湘西。史书曰：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郡、黔郡也。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昆连，介于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接壤，南通黔，西通蜀。^[1]

一片犬牙交错的广漠山地，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

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这里公路未通，火车不行。只有两条屡见于古典词章的河流——沅江与澧水，从群山中闯荡而出，注入洞庭，成为湘西与外部世界交通的要道。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2]

一派原始荒蛮的景象，仿佛是别一个国度。

这些历史遗迹，有的尚相当完整，有的仅留下一点残痕。日落黄昏，你试登上山顶，去搜寻凭吊边墙遗迹，已经无法想象它当年是什么样的模样了。这座始筑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八尺、厚五尺的小“长城”，是为防范苗民“叛乱”而设的。虽经历史风雨剥蚀，如今只余一点残痕依稀可辨，但专为称颂帝王“文治武功”的正史，却留有赫然分明的记载：

始于嘉庆朝征苗之役，……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扰。其险隘处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设碉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汛碉一百二十一处，古文坪及保靖县境内，设汛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3]

不难想象，广袤的中国国土上这一弹丸之地，仅四个县境内，成一线排列起一千五百余处碉卡屯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望

着眼前的断墙残碣，依稀可以想见烽燧遍地、刀光蔽日，依稀可闻战鼓震天、号角连营……

沉重的历史落到你的肩上，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断墙残碣上，刻写着一个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

自古以来，苗、瑶、侗、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

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

于是，这些“安土重迁”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七百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二百余里”的苗疆。

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达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

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其后一百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

二、神尚未完全解体

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当历代枭雄逐鹿中原，拼杀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湘西只是戏剧舞台外的看客。只有强者终于抢占了金銮殿，坐稳了皇帝宝座，想起“不服王法”的边鄙“蛮族”的时候，才会遣王师南会“蛮族”。

历代中央王朝对湘西“蛮族”的征服，即便在政治上，也几乎只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无论周代时崇山的“荒服”，东汉马援南征的马革裹尸以还，宋以前在湘西所设郡县的“时设时废”，还是五代至清康熙年间，延续八百年的“土司”制（以少数民族首领治理的政治制度，在湘西，土司多由土家族首领担任，而在苗区，仍为“既无流官治理，又无土司管辖的‘生界’”，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称“合款”）。直到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然而，在这每一次政治军事冲突之间，史籍留下的却是大片空白。在这空白里，应该填写的是湘西各族人民平凡的人生哀乐，他们以特有的生存与创造方式，为自己、为子孙，同时也为历史发展作出了努力。而这些，却一律被历史所遗忘。正是这为历史所遗忘的部分，层积着湘西本土文化——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的丰厚内涵。在湘西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历史夹缝里得以延续。

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状态，这里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虽然，在固定的田地上牛耕已成普遍的农作方式，但同样遍及山乡的原始的刀耕火种——本地人称做“砍火畲”与之并行